



“一个泉眼里岂能发出甜、苦两样水呢。”

源头不同，结果自然会不同。正如苹果树结苹果，桃树结桃子，照样，圣经的根源不同，结的果子也就不同。安提约的纯正抄本，结出了好的果子，它产生出14世纪法国的刚强的基督徒，产生出1611年问世的、改变世界的钦定本圣经，使基督徒忍受了天主教的逼迫，而且生存下来。当时，天主教烧死了迈尔斯·科弗代尔，也将丁道尔的骨灰扔在泰晤士河里。它在1874年的京委本圣经中统一了圣经术语和地名。它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，当时路德就是阅读了罗马书第一章。它建立了一个国家，当时有一群浸信教会的信徒在约翰·鲁宾逊的带领下，逃到北美。它创立了一个国家的宪法，当时以撒·巴克斯骑马走了三天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木匠厅，呈递了一个由相信圣经的人签署的宪章，内容就有美国新政府当给人民宗教自由。它在太平天国作乱期间和义和团暴乱时期鼓励基督徒坚守真的信仰。所以，这个抄本的果子是显而易见的。而亚历山太式文本，则在历史上结出了坏的果子，对教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它催生了法国革命，使百姓完全抛弃了道德，因为天主教试图用暴政控制法国人民。在中国，它导致了教会与政府的联合，即三自会，其后一直负责和合本的印刷。它产生了在德国境内猖狂肆虐的高等批评，这高等批判否认大鱼吞吃约拿的故事，也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复活。使用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人是怎样的人呢？是如奥利金的人，他阉割了自己；又如威斯科特和霍尔特的人，他们不相信处女生子。最起码，它叫人怀疑天主的话语，也教导每一个男人、女人、孩童：圣经的最佳审判者是个人。

源文本如何影响了中文圣经的翻译

现在我们要触及问题的核心，即源文本如何影响了中文圣经的翻译。威斯科特和霍尔特所用的两个败坏的抄本——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，在19世纪中叶已经在传播，但理性的学者在翻译圣经时不会考虑使用。马礼逊和马士曼在1822年和1823年分别出版了他们的文理译本，里面没有提辛多夫所发现之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一丁点影响。我们无需说明他们使用了何种抄本，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，只有一个可信的文本。天主教在19世纪也承认他们与主流基督教的差别，在雷永明的带领下，他们于1935年出版了一本中文圣经。很好笑的是，像利玛窦这样的天主教徒很早就想将圣经翻译成中文，但他们觉得圣经没什么益处，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，真正翻译圣经却是很晚之后的事了。然而，那些相信圣经至关重要的人，一有机会就着手翻译圣经了。马礼逊、马士曼、高德、施约

瑟、米怜，都将翻译圣经视为他们的第一要务。马士曼最早将全本圣经翻译成中文，之后很多人也翻译了圣经，但在1902年出版的京委本之前，所有译本，包括京委本，都出自同一个文本。当时的译者就如何翻译一些词语（如天主、洗礼、教会、灵）起过争论，但他们从未就圣经的源文本起过争论。当北京委员会翻译的第一本白话文圣经问世之后，50年来译经的工作终于划上句话，人们终于可以休息，终于有了一本可用的圣经。他们的译本终于将地名和术语固定下来。虽然某些争议还未解决，比如怎么翻译天主，但是这本圣经非常成功。然而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天主的话语成功地进入一个文化之后，败坏的亚历山太式文本就会尾随而至。1890年，一个委员会成立了，他们使用英语圣经（英语修订版圣经）做底本，要翻译出一本比京委本圣经“更准确”、“更有学问”的圣经。他们的选择是明显的，体现在他们翻译的一些经文上，这些经文的翻译偏离了亚历山太或安提约的任何抄本。在出伊及记，英语圣经有个短语是“abomination of the Egyptians”，它是何意？就是出伊及记的作者称伊及人所敬拜的（名为阿皮斯的牛）为可厌恶的，可憎的。但和合本委员会不明白英语的意思，他们翻译为“埃及人所厌恶的”，而不是京委本所译的“伊及人所敬拜的牲畜”。此外，让人诧异的是，京委本委员会在1865年决定翻译圣经，他们只用了六年就出版了新约，到1879年便译完了旧约。和合本委员会在1890年就成立了，但到1912年才译完新约，到1919年才译完整本圣经。他们可以说，他们用的时间长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比京委本委员会的更高，但事实是他们就如何翻译有分歧。曾有一时，和合本委员会好像要走委办译本委员会的路，就是产生分歧，彼此不能同意，最后分裂，翻译的圣经不可用。开始的时候，几乎有一半的人出于不同原因离开了该委员会。其实，他们很“没学问”，所以他们在翻译旧约时大量倚靠京委本的内容，而且在1912-1919年将和合本的新约与京委本的旧约订在一起出版，好被中国的基督徒接受。这个决定好像是打了1902年的京委本一记耳光。这个新译本是完全不必要的。和合本迎合的是人的智慧；教会希望与天主教不同，和合本便投其所好。京委本使用“天主”的称号，也允许“上帝”和“神”。但和合本只使用“上帝”和“神”。讽刺的是，和合本使用的抄本是教导天主教教义的、属于天主教的抄本，他们却不使用“天主”，以此假装他们反对天主教。无人问他们用的是哪个抄本。中国基督徒经常在旁注里看见“原文有”和“抄本写”的字样，慢慢就习惯了，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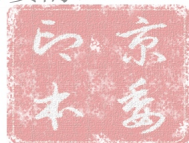
译本不过是译本，决不会是完美的，和合本是更好的译本，因其时间更晚，且是从英语翻译过来。今天，人们判断所有译本，都将它与和合本对比，看中国人能否接受。但这是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团体相反的，因其他团体相信源自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的纯正圣经。人们怎么想从来都不重要，语法怎么说从来不重要，有多少学者的贡献从来不重要，什么是“更接近”原文从来不重要。主要的目标是，将那完美保存的抄本中的完美的话语拿过来，翻译成可理解的中文。语法会改变，人们对文本的看法会改变，但天主的话语是不改变的。对高德版圣经、米怜版圣经、马礼逊版圣经、京委本圣经的攻击，关乎的总是语法、标点、中国的基督教对某术语的看法，而非译本源自哪个抄本。

时至今日，几乎每一个新的译本都离不开和合本，原因有两个：第一、教会让文化（而非源文本）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圣经，第二、人们习惯使用的圣经，不允许改变。今日在美国，普通人都喜欢没有“大男子味”的圣经，所以他们将天主的男性代词改成了中性代词或女性代词。今天，保守的基督教快要死去，多数人不喜欢圣经谴责罪恶，如奸淫、鸡奸、淫乱、懒惰，所以他们喜欢更温软的、更易接受的圣经。如果大众接受的变成了我们的标准，那任何一个译本都不会用太久，因为社会在变，所以译本会一直跟着社会变。在中国，如果人选择和合本而非京委本的唯一理由是大众接受，我们就必须承认，这是一点也没有学问的。任何深思的人，都要看看译作的源文本，来决定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《老子》或莎士比亚的著作也是一样。这个话题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帮助我们知道京委本和和合本的主要差别。和合本圣经90年来一直处于垄断地位，人们在此争论中能找到答案。

结论：

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除了一个方面，就是所用抄本之外，和合本不能在其他任何方面与京委本相比。出自亚历山太、埃及、安提约的抄本大为不同，人在贬低某译本或称赞某译本之前必须考虑到这点。但是今天，中国人完全忽略了这问题。中国的多数圣经都源自纯正的抄本，比如马礼逊译本、高德译本、马士曼译本、米怜译本、麦都思译本、裨治文译本、京委本、委办译本。只有一个著名的译本来自亚历山太式文本，就是和合本。人不由得想，中国有可能会滑入到欧洲中世纪的情况，即惟一的圣经就是天

主教认可的圣经。今天，看一个圣经是否是好的，只看他们怎么称呼天主，人们是否会接受。毋庸置疑，这与中国人思维之核心，即集体主义，有密切的关系。但人们必须记住的是，和合本在被中国的基督徒“普遍接受”之前，京委本已经被中国人接受和喜爱了五十年，之后才被和合本取代。代表白话文标准的巴金、胡适、鲁迅，及其他很多人，曾高度评价京委本（他们说的就是新旧约全书）。京委本出版之后，美国圣经协会在一年内卖出的圣经是最多的，超过了其他语言的圣经，创下了记录。牧师们曾说，他们在天坛门口，在长江岸边发圣经。所以，说中国人不接受京委本，这话是错的，因为他们好多年里都是接受的。与京委本相比，和合本拥有的惟一优势是它的垄断地位，那是因为基督徒不知道和合本的真正根源，过去九十年它完全垄断了市场。我们必须陈述此话题，因为在全球每一个重要的语言中，都至少有两个代表性的圣经，代表了两个相异的文本。只有在中国，这个事实被忽视了。排除个人喜好，我们不能忽视，一个代表了被教会长久使用的安提约抄本的译本是必要的。



“你们当精考细读主的书”
- 赛34:16

Peking Committee Bible



“你们当精考细读主的书”
— 赛34:16

Peking Committee Bible



“你们当精考细读主的书”
— 赛34:16

Peking Committee Bible

新盼望浸信教会

xinpanwang.podbean.com

xinpanwang@126.com